

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编者按：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长年致力于考古学的研究与实践。从考古学视角怎样理解古典学？如何通过古典学做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研究与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深入挖掘古典文明的当代价值，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刘庆柱。

用古典学的方法论研究中华文明

学术家园：不久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古典学研究成为时下学术领域的一个焦点。首先请谈一谈您对于古典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理解？

刘庆柱：古典学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在古希腊罗马寻找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并在19世纪的德国逐渐成熟。

不同于古代西方，中国“史官传统”悠久，自2000多年前就设有史官。史官必须秉笔直书，真实客观地记录历史，正确的成功的要写，错误的失败的也要写。史官书写中国历史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至今。由此，中华文明有着从《史记》到《明史》的总计3213卷、约47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所记内容起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这样的文献历史在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总结，以史为鉴，以古鉴今，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监督机制。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随着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中国百年考古一系列重大发现，佐证了我国重要古代历史文献的“历史信度”，使之成为“信史”。比如20世纪30年代殷墟的考古发现，佐证了司马迁《史记·股本纪》关于商代历史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明，把中国历史连在了一起，也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需要相关领域的学者做好中华文明的阐释与研究，不仅是对内，还要对外。新时代以来，相继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以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为基础，结合天文学、古文字学、文献史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传承与发展



云梦虎地秦简

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们喜欢讨论文明的话题，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文明”一词是对社会复杂事物的一个整体概括，当人们谈论文明时，其意涵非常丰富并且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发展史，不仅古代世界有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现代世界仍然可以被划分成几大文明。这些文明都具有宏观的形态，但确实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从微观方面来看，“文明”一词也可以表达细节，比如以前我们有口号“讲文明，讲礼貌”“讲文明，树新风”，这就是提倡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体现文明。

学术界对文明深有研究。近年来，由于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文明成

在世界视域下，我们用产生于西方的古典学的方法论，结合中国实际、结合科学发展成果来研究中华文明。用相同的方法论来研究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明，才能在说清楚自身历史与文明的同时，弄清楚他国的历史与文明，互相尊重且各具特色，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才更易于展开，从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做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研究与阐释

学术家园：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孝感市考察时强调，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请您结合考古学研究实践，讲述如何从中国古典学研究角度来做好中华文明特性的研究与阐释？

刘庆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我看来，这五个突出特性之间是存在内在逻辑的。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多年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其“连续性”是基于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创新性”，比如中华文明中的“文官政治”与“贤明政治”构成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创新特色。同时“向内凝聚”的统一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而“大一统”的理念，则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让中华民族紧紧抱成一团，即使变得强大，也依然追求和平与合作。就像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这条“和合之路”，带给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是和平共处、互惠互利。

研究古典学不只是为了研究自身古典文化与古典文明，还要在尊重他国文化文明的前提下，探寻中外文化文明的同与异。因此，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古典学研究，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据此更真实具体地认识丰富多彩的历史，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考

古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证性。考古学用发掘实物来证明历史、活化历史，从而助力于讲清楚、讲透彻什么是中华文明，我们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文明。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不同的生存条件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比如同样是戏曲艺术，北方戏曲的声腔偏高亢，南方戏曲的声腔则偏轻柔。虽然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但不同的文化并不等于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国家是两个概念。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涵。

“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华文明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制，中国很早就有一统的观念，各民族、地区而和不同，虽然地形、气候、风俗习惯等不一样，但紧密相依相连，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同文化与文明，也造就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古典学的方法论来证明，世界不同地区“文明史”的相同与各自“文明特色”，将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五彩斑斓的“文明史”呈现于世人。

立足于中华文化研究古典学

学术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唤醒和激活古典文明中的精华，挖掘其当代价值，从中获得教益？

刘庆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所有科学都是服务于社会的，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古典学也不例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文明。用古典学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华文明有什么作用？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国历来重视历史，如果我们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就等于将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不

断裂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就会走弯路，就会失去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华文明”的“本质”。

古典学早在1927年就传入中国，1928年在中山大学设立了“语史所”，与此同时国家又设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可以看出世界古典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发展历史，并取得了辉煌成果。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靠文字，还要靠实物，把考古学和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结合，把自然科学技术应用到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中去。这使中华文明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比如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9项，居全球首位。又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古典学研究是服务于文明研究的，以便于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文明“共建”。怎样共建？寻找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同一性。而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中西共通的。我的老前辈夏鼐先生，研究历史是学贯中西的，一方面将其他人之所长变成自己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夏鼐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大力提倡在考古领域运用科学技术。如今古典学研究已是多学科交叉，依然要强化它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

学术家园：您还曾谈到古典学的终极学术目标是研究人类文明史。当前中国古典学研究方兴未艾。新时代的古典学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

刘庆柱：古典学的终极学术目标是研究人类文明史。中国的古典学应该以历史学为核心，明确研究目标，找出中华文明的共性和特色，这样才有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所谓文明交流互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大胆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文明的精髓。前提是要有正确的立场，即立足于中华文化，立足于中华文明自己的特色。世界文明共鉴，离不开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这也是当前中华文明研究走向世界的必然。因此，古典学研究者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我看来，古典学不单单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学说，它甚至还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存和信誉。新时代古典学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运用古典学，在谦虚学习借鉴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把中国历史讲清楚，把中华文明讲清楚，最终促进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 学海星光

首先是好学。孔子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即使君子，也认为没有做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然而，孔子反复强调自己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要求学生宣扬他的好学精神，“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自觉自愿地学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是区分人的境界高低和素质优劣的重要依据。只有通过学习，仁德、智慧、诚信、正直、勇敢、刚强等道德品行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的好学，不求外在的物质满足，不因人生的曲折而困惑，不为一切危险和苦难所挟制，而是追求大道，行走正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习是终身需要和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次是内省。儒家十分重视内省的修身方法。内省不是一时一地一事的反思，而是人生的常态，有着广泛的内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认为，内省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内省，感到自己的所言所行恰当，没有过错，就会问心无愧，处之泰然，“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省是发现与贤人的差距，向贤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重点是学习他人的善性和德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内省是改正错误缺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并不

是文明发展整个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但流动的文明会展示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如果文明开化与自然野蛮相对，我倒认为，秩序的形成是文明的本质体现。这种秩序既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交往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凡是形成秩序的地方，必定出现了文明，而这样的“文明”呈现，与文明中的每一个人有关，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创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

如此，在中国的文明形态里，“礼”就是秩序的最好体现，而礼器正是“礼”的物质表现。青铜器里有大量器物就是礼器。比青铜器更早的礼器是玉器。良渚遗址中出土了玉琮、玉钺等器物表明，“礼”，即秩序，在5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由此认定中国文明五千年不是问题。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开大学讲座教授）

学者笔谭

《论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学习《论语》，有利于培育人文素养。培育人文素养，目的是要把人做好。把人做好，是把事做好的基础，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

依据《论语》塑造的理想人格，把人做好，就是要做一名君子。《论语》提及君子有100多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寄托着孔子太多的人生理想。在孔子看来，人生包括对内追求与对外追求两方面内容，对内追求是自我修身、完善人格；对外追求是积极入世、建立事功、造福社会，从而形成“内圣外王”的文化信仰。君子是人生对内追求与对外追求的统一体，是内圣与外王的主要载体。

《论语》生动而具体地刻画了君子形象，那就是文采与质朴的有机统一。文采属形象，质朴属人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有爱心、有智慧和有责任心，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就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规范，“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依据《论语》提供的修身方法，培育人文素养主要有好学、内省和躬行的路径。

首先是好学。孔子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圣人，即使君子，也认为没有做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然而，孔子反复强调自己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要求学生宣扬他的好学精神，“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且自觉自愿地学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是区分人的境界高低和素质优劣的重要依据。只有通过学习，仁德、智慧、诚信、正直、勇敢、刚强等道德品行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的好学，不求外在的物质满足，不因人生的曲折而困惑，不为一切危险和苦难所挟制，而是追求大道，行走正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习是终身需要和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次是躬行。躬行就是实践，就是学以致用，否则，无论好学还是内省，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指出，躬行是要努力实践仁的理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仁的主旨是爱人；是推己及人，尊人，帮助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了躬行仁的理念，可以抛弃人生的一切，甚至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躬行是要遵守礼制。礼制是依据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角色和定位，要求人们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以利于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君子而言，既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礼制，“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更要在关键时刻崇尚礼制，“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躬行是要坚持诚信，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躬行是要谨言慎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谨言慎行，就是不要言过其实，真正做到说话算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谨言慎行，必须反对巧言令色，因为“巧言令色，鲜矣仁”。

躬行是实现人文素养的唯一途径。孔子最为关心的是好学和自省之后的实践问题，“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习《论语》，就是要着力培育人们的躬行品格，在实践中提升、完善和验证人文素养，既要内圣，又要外王，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事，从而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论语》育人文

夏海

可怕，可怕的是文过饰非，不改正错误，“过而不改，是谓之过矣”。有错必改，是内省的必然要求，也是君子人格的魅力所在，“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内省是完善人文素养的重要方法。学习《论语》，就是要着力培育人们的内省德行，经常扪心自问，对于事业和工作，是否做到了敬业和履职尽责；对于朋友和同事，是否做到了真诚和信守承诺；对于学习和读书，是否做到了“温故而知新”，是否做到了学与思相结合。尤其是遇到人生困境和事业曲折时，内省就是要从内部找原因，不要怪罪于他人，而要自责于自身；不要自怜自艾，而要豁达开朗，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

再次是躬行。躬行就是实践，就是学以致用，否则，无论好学还是内省，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指出，躬行是要努力实践仁的理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仁的主旨是爱人；是推己及人，尊人，帮助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了躬行仁的理念，可以抛弃人生的一切，甚至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躬行是要遵守礼制。礼制是依据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不同角色和定位，要求人们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以利于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君子而言，既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礼制，“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更要在关键时刻崇尚礼制，“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躬行是要坚持诚信，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躬行是要谨言慎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谨言慎行，就是不要言过其实，真正做到说话算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谨言慎行，必须反对巧言令色，因为“巧言令色，鲜矣仁”。

躬行是实现人文素养的唯一途径。孔子最为关心的是好学和自省之后的实践问题，“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习《论语》，就是要着力培育人们的躬行品格，在实践中提升、完善和验证人文素养，既要内圣，又要外王，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事，从而为社会进步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流动的文明

俞金尧

概念问题上争论不休。

考古学家们认为，文明的诞生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这样，有没有文字，就成为文明认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不过，以文字的出现为文明判断的标准，不应当是铁律。因为这个标准具有局限性。印第安人大多数没有文字，但谁都不能否认印第安人创造了独特的文明。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东和近东古代文明时，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呈现出来。用19世纪的标准来界定20世纪在中国发现的早期历史形态，本身就是个问题。比如四川三星堆考古发掘说明，三星堆文明高度发达，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文字，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发达的文明应该有更久远悠久的历史。可见，文字是判断文明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不应当是一个必要条件。

文明是流动的复杂整体，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推动文明发展进步。文字的出

